



我自十余岁起,就开始读书。读到现在,将满六十年了,中间除大病或其他特别原因外,几乎没有一日不读点书的。然而我没有有什么成就,这是读书不得法的缘故。我把不得法的概略写出来,可以作前车之鉴。

我的不得法,第一是不能专心。我初读书的时候,读的都是旧书,不外乎考据、词章两类。我的嗜好,在考据方面,是偏于诂训及哲理的,对于典章名物,是不大耐烦的;在词章上,是偏于散文的,对于骈文及诗词,是不大热心的。然而以一物不知为耻,种种都读;并且算学书也读,医学书也读,都没有读通。所以我曾经想编一部《说文声系义证》,又想编一本《公羊春秋大义》,都没有成书。所为文辞,不但骈文、诗词,没有一首可存的,就是散文也太平凡了。

## 我的读书经验

蔡元培

到了四十岁以后,我始学德文,后来又学法文,我都没有好好儿做那记生字、练文法的苦工,而就是生吞活剥看书,所以至今不能写一篇合格的文章,做一回短期的演说。在德国进大学听讲以后,哲学史、文学史、文明史、心理学、美学、美术史、民族学,统统去听,那时候这几类的参考书,也就乱读起来了。后来虽勉自收缩,以美学与美术史为主,辅以民族学,然而他类的书终不能割爱,所以想译一本美学,想编一部比较的民族学,也都没有成书。

我的不得法,第二是不能勤笔。我的读书,本来抱一种利己主义,就是书里面的短处,我不大去搜寻它,我正注意于我所认为有用的或可爱的材料。这本来不算坏;但是我的坏处,就是我虽读的时候注意于这几点,往往为速读起见,无暇把这几点点摘抄出来,或在书上做一点特别的记号。若是有时候想起来,除了德文书检目特详,尚易检寻外,其他的书,几乎不容易寻到。我国现虽有人编索引、引得等等,各种专门词典也逐渐增加,寻检自然较

易,但各人有各自的注意点,普通的检目,断不能如自己记别的方便。

我常见胡适之先生有一个时期,出门常常携一两本线装书,在舟车上或其他忙里偷闲时翻阅,见到有用的材料,就折角或以铅笔作记号。我想他回家后或者尚有摘抄的手续。我记得有一部笔记,说王渔洋读书时,遇有新隽的典故或词句,就用纸条抄出,贴在书斋壁上,时时览读,熟了就揭去,换上新得的。所以他记得很多。这虽是文学上的把戏,但科学上何尝不可以仿作?我因从来懒得动笔,所以没有成就。我的读书短处,我已经经验了许多不方便,特地写出来,望读者鉴于我的短处,第一能专心,第二能勤笔,这一定有许多成效。

蔡元培(1868-1940)是浙江绍兴人,近代著名教育家,被誉为“学界泰斗,人世楷模”。本文发表于1935年,蔡元培年近七十,回顾近六十年读书治学经历,不空谈高明读书法,反倒坦诚剖析自身两大弊病,警示后人。

## 张清华:读尼采,才感觉灵魂被唤醒

记者:您有枕边书吗?

张清华:最近的“枕边书”是荣格的《红书》,当然,我还没有完全读懂这部巨著,但我意识到它是一个巨大的世界。荣格试图用一种神奇的交叉语言——梦境叙述、诗歌话语、经典形象、自我与对象交叠的分析,展现一个神秘而奇异的认知空间。看得比较费力,还得借助很多其他资料。但它非常吸引我。

但对我来说,严格意义上的枕边书并没有。主要跟视力和阅读习惯有关,我40岁左右时就开始老花眼,最近视力退化,躺下几乎看不了书。我经常会拿出来重读的,主要是专业意义上的书,如黑格尔的《精神现象学》、海德格尔的《林中路》、勃兰克斯的《十九世纪文学主流》,其中《精神现象学》可能是“革命话语”的一个重要来源。尼采的《悲剧的诞生》是我的启蒙之书,柯林伍德的《历史的观念》对我思考什么是历史有醍醐灌顶的作用。还有丹尼尔·贝尔的《资本主义文化矛盾》,这本书是我早年做“先锋文学批评”的话语的重要来源。再有就是本雅明的《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》,这些书都比较“老”了。比较晚近的是德勒兹的《批评与临床》,我看到西方的哲学家们一直在翻新他们的思想,但又一直在认真地传承他们的前人。

反复重读的是弗洛伊德的《梦的解析》。弗洛伊德的书我基本上都通读过,所以我比较偏爱精神分析的方法,写过一本《春梦六解》。我觉得我主要的观察能力和理解能力是来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,有了这一套理论,看任何作品就具有了“X光”一般的眼睛,能够看透文本内部的构造、人物的潜意识活动。

记者:您看得最多的书是什么?

张清华:《史记》《红楼梦》《鲁迅全集》都是经常要拿出来查阅翻看的。另外就是和专业有关的书,当代文学研究的阅读任务比较重,小说、诗歌、散文……每年每天过手的作品量很大。

记者:面对海量的作品,阅读有什么特殊方法吗?

张清华:年轻的时候可能只是囫圇吞枣,或者有时候也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,但是多年以后发现很多东西是“印”在了无意识里,可能也跟个人的记忆力有关。

再一个就是直觉。我认为直觉有时候会好过思想和理性。当时似懂非懂,但是多年以后再回去看,会发现从直觉上领悟到的某些东西是正确的,经得起时间的检验。

比如说很年轻时候的阅读,《十九世纪文学主流》是我理解专业研究的一个启蒙之作;《悲剧的诞生》是



张清华,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

我理解诗歌和美学的启蒙之作。在此之前我读黑格尔的《美学》,是一大堆观念体系,但是一读尼采,才感觉灵魂被唤醒。

如果没有读尼采,我永远不会读懂鲁迅的《野草》。因为《野草》的文体,我认为主要来自于尼采和克尔凯郭尔,没有读懂他们,也就很难进入《野草》。

记者:对书的选择,判断依据什么?

张清华:专业的压力。我最早曾在一个很小的师范专科学校教外国文学,教学期间我系统地读了从文艺复兴到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文学。读了莎士比亚,才真正建立了文学的框架。原来我偏爱中国古典文学,但我想如果没有莎士比亚作为一面镜子,我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理解会更加浅尝辄止。因为莎士比亚是专门探究人性的复杂和微妙的“作家中的作家”。

所以歌德说,剧作家在一年当中读莎士比亚不能超过一部,多了就会被他灼伤。因为莎士比亚在一切人性的向度上都探求尽了。歌德真正读懂了,他崇敬莎士比亚,自己也是莎士比亚最好的学生。有时候读懂一部伟大作品,其实是它召唤你的灵魂进入了一个更高层次,进入了理解力、思考力和表达力更高一级的境界。读书不在多,有时候一部作品、一部作品里的一句对话就让你醍醐灌顶。

《哈姆雷特》里有一个对话场景,哈姆雷特碰见了他原来的两个兄弟,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,但是他们都投靠了弑兄篡位的新王克劳狄斯,碰见以后非常尴尬的一段对话,把所有无法说出口的秘密比喻成他们仿佛生活于“命运女神的私处”,通过诙谐幽默又深入骨髓的比喻,充满讽刺地写出了他们所有人的处境。

莎士比亚的语言简直妙不可言。我大学时期偏古典文学,工作四年爱上了外国文学,读研究生以后回到现代文学,工作以后又转向当代文学。转换的场域是

让我受惠的。后来有机会去德国海德堡大学工作半年,才知道他们规定,大学毕业后不许在同一所大学继续任教,一个老师不允许两个学期重复讲一门课,必须经常转换领域。我觉得这很重要,就是让自己的研究领域要有流转。我也从事小说批评,但我认为小说批评受惠于诗歌阅读,诗歌阅读和诗歌批评的文字反哺了我在其他领域的研究。所以我也甘心使用流行的学术话语,我希望能够有一点儿自己的个性。

记者:您怎么评价阅读对自己的影响?

张清华:阅读分为好多种类型。有的阅读只是查找资料,找一个实证支撑材料的使用,仅此而已。有的阅读是思想性的,读着读着可能完全忘记了文本本身,沉浸到无意识的直觉、充满遗忘的阅读,这种漫不经心、无目的的阅读,我认为是最珍贵的,因为它完全是在以自我为中心的状态,借助阅读,你自己在潜滋暗长。

还有一种方法论式的阅读,你必须弄清楚它到底在说什么,怎么说的,你要知道这套理论的基本原理是什么,底层逻辑是什么,如果搞不清楚,那就完全是一知半解。还有一种随意性阅读,就是获取信息量,比如说面对大量的作品,肯定需要信息量的获取、有选择性地浮光掠影跳跃性阅读,这也是不可或缺的,要有信息量,不然就可能变得闭目塞听了。

记者:您经常会给学生推荐书吗?

张清华:每一届学生我都会给他们推荐书目,主要是西方现代哲学和思想史、文化史方面的一些书,还有和我们专业比较靠近的大家,比如说罗兰·巴特、巴赫金、杰姆逊或者是布鲁姆,等等,对学生的学术研究和文学作品的解读会有直接帮助。

记者:假如去荒岛只能带三本书,您会选择哪三本?

张清华:《红楼梦》《莎士比亚全集》,再带上荣格的《红书》,慢慢细读。

记者:如果有机会组织一场宴会,您想请哪些人?

张清华:请我小时候的玩伴、中学时期我喜欢的女同学(这不过分吧?)、再请上50岁以后的好朋友——因为50岁以前的有些朋友已经慢慢疏远、遗忘,50岁以后真正的好朋友,可能是有一定深度的。另外,再请同行里的三五好友,包括诗人、作家、同行。

记者:如果说有可能会见到一个人(古今中外都可以),您会想见到谁呢?

张清华:想见到我已逝的硕士研究生导师,希望和他有一次长谈。

据《中华读书报》